

隔代教養經驗——敘事研究

邱珍琬*

摘 要

本研究呈現一個隔代教養模式的案例，不同於以往的若干研究是以祖輩角度來看隔代教養實際，而是以一位接受隔代教養的成年人，以故事敘說的方式來談她的受教養體會與經驗。從鍾琦的敘說中，發現隔代教養的優勢有：協助或減輕親職工作壓力，家族文化與價值觀的傳承，祖孫間的情感聯繫與依賴，祖輩擔任孫輩角色模範與學習對象；在挑戰方面則有：孫輩早熟與未能享受童年的遺憾、經濟與工作責任負擔、管教問題、兒輩情緒的出口與責難。

關鍵字：成人受教養經驗、隔代教養、優勢與挑戰

*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

隔代教養經驗——敘事研究

邱珍琬

壹、緒論

隔代教養在經濟大環境的衰退下，儼然成為「親職外放」的一種較可接受的替代模式，且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目前的隔代教養文獻中，仍以問卷方式進行探討居多，也將焦點放在教養的祖輩，本研究試圖以一位隔代教養家庭中成長的女士敘述其成長歷程中與祖父間的互動，以她的角度來探討隔代教養中的實際與反省，期待可以增添研究文獻的豐富性，也自不同觀點來檢視隔代教養的優窳。本文採敘事研究方式，請參與者鍾琦（化名）針對自己在祖父的教養下的成長為主軸所發展的故事，然後就其內容做分析歸類整理。結果發現隔代教養的形式有多種，主要視研究者或是參與者的定義而定，隔代教養基本上是不得已的一種安排、但並非都呈現負面結果，在成年的受教養人身上發現許多代間親情的流露與省思，許多文化與價值觀的傳承也在受教養人的生命經驗中慢慢突顯其影響力。

貳、文獻回顧

一、從 Erikson 的「老年的重要影響」到隔代教養

Erik H. Erikson (1986) 在“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老年的重要影響）一書中提到「成熟的成人意味著投入一系列生命傳承的活動中」（p.50），所謂的「傳承」（generativity）也就是「承先啟後」的工作，同時也是文化的傳承與更新，對於「祖父母級」的老年人來說，這樣的「承先啟後」工作似乎是自然天成、理所當然，或許對於許多人來說，祖輩角色提供了他們「第二次機會」來發揮「傳承」的功能（Erikson, Erikson, & Kivnick, 1986, p.91），然

而如果是以擔任隔代教養的祖輩來說，必須重新負責親職工作，不僅讓其生命週期 (life cycle) 有了改變，也多添了一些變數。早年 Neugarten 與 Weinstein (1964) (cited in Weistheimer & Kaplan, 2000, p.52) 曾經將美國的祖父母分為五種基本型態：好玩 (fun-seeking) — 重視與下一代的關係經營、正式 (formal) — 寵愛孫輩也偶而協助照顧孫輩、疏遠 (distant) — 只有在節慶或特殊日子會表現祖輩角色、家庭智慧的寶庫 (reservoirs of family wisdom) — 威權與提供忠告、以及替代雙親 (surrogate parents) — 替代父母教養孫輩；其中「疏遠」與「智慧寶庫」二型與孫輩關係最不親密，而「替代雙親」就是「隔代教養」，似乎囊括了五種角色與功能。固然老年人的活動力高低與其生活型態如何主要是個性的因素，但是一般的人 (老年人也不例外)，也希望可以有所功能、貢獻，來肯定自我的價值，即使只是提供忠告與建議，都有關懷與貢獻心力的意涵 (Erikson et al., 1986, p.89)；有些老年人以勞動作為自己主要的娛樂，不僅是從中得到自我能力的肯定、也同時感受生命的強度與韌力 (p.179)。縱然生命會隨著肉體的消逝而去，也誠如 Roger Rosenblatt (1999) 在緬懷小甘迺迪 (J. F. K. Jr.) 時所寫的：「衡量生命常常是以小單位的方式進行」 (p.41)，也就是說生命的實質是以零碎記憶方式存活在相關人的心中，祖輩當然也希望自己可以「活在」下一輩的記憶裡 (Erikson et al., 1986, 95)，這也許也是所謂「存在認同」 (existential identity, Erikson et al., 1986, 130) 的一種形式，也是一種生命的不朽與延續 (Erikson et al., 1986, 131)。以這樣的脈絡來看「隔代教養」，似乎有較為正向的意義，這其中包含了「生命延續與不朽」、「傳承與貢獻」、與「自我肯定與價值」。

隔代教養，或是由祖輩擔任教養工作的方式，已經成為目前親職外放的一種新趨勢，而近年來祖孫家庭的遽增，不只反映出隔代教養家庭已不是原住民族群的專擅 (簡文元，1998；陳建志，1998)，隨著家庭建構出現改變 (如離婚率高、未婚生子) 及經濟情況的變動 (如父母在外地工作或失業)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邱珍琬，2002a/b)，類似以祖輩為主要教養人的情況已成為家庭建構的一種模式。我國隔代教養的家庭數，依據陳麗欣等 (1998) 的估計約在 4% 到 7% 之間，而在美國社會中，此類祖孫家庭約莫有 5% 到 10%，其中尤以非裔美國家庭佔多數 (Fuller-Thomson, Minkler, & Driver, 1997; Pinson-Millburn, Fabian, Schlossberg, & Pyle, 1996; Roe, Minkler, & Barnwell, 1994; Woodworth, 1996)，這與非裔家庭多以女性為戶長、以及藉助延伸家庭協助撫養下一代的傳統有關；這樣的東西方家庭趨勢，主要是因為父母親不在——也就是

「遺漏的一代」(skipped generation) (Bryson & Casper, 1999, cited in Fuller-Thomson & Minkler, 2000, p.3) 所造成的結果。

接受隔代教養的孩童年齡層，自出生到十歲以上不等，照顧時間相當，其中多數孩童是自出生就與祖輩同住(李玉冠，2000；邱珍琬，2002a/b；黃佳儀，2003；Woodworth, 1996; Fuller-Thomson et al., 1997)。隔代教養的原因有許多，主要是因為雙親不能適當履行親職，包括雙親之一死亡(或瀕死)、拋棄、入獄、嗑藥、失業、漠視或虐待孩子、心理疾病，而離婚率增高、未婚媽媽、愛滋病所遺留下的孤兒、還有立法上的改變(陳麗欣等，2000；Heywood, 1999; Jendrek, 1994; Pinson-Millburn et al., 1996; Pruchno & Johnson, 1996)，我國(李玉冠，2000；邱珍琬，2002a/b；陳麗欣等，2000；黃佳儀，2003)的情況頗為類似，依序為父母離異或工作、喪親、母失職、或無他人擔任親職工作等，其中以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有較好的生活適應(黃正吉，1998；吳佳蓉，2002；黃佳儀，2003)。隔代教養模式雖然絕大多數是不得已的安排，以「家庭保存」(family preservation)的觀點來看，隔代教養主要是為了孩子的福祉、避免孩童因為特殊父母因素(即不能履行親職)而必須安排到其他社會福利機構，所做的最好安置(Connealy & DeRoos, 2000)。

國內對於隔代教養的初步調查，發現是父系祖父母承擔教養責任的居大多數(邱珍琬，2002a)，與美國地區的調查結果不同(母系祖父母)，主要是因為美國夫妻離異之後，孩子的監護權多半歸由母親(Matthew & Sprey, 1984)；固然不少隔代教養家庭並不是只有祖孫兩代同居、而是有父母親其中一人也在同一居處(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1997, cited in Strom & Strom, 2000)，但是基本上教養責任還是由祖父母承擔(邱珍琬，2002a)。本研究中的隔代教養定義也是祖孫三代同堂，只是祖輩擔負了教養的重任。

隔代教養原因諸多，主要是因為父母失職、或是家庭結構變化下的結果，因此必須做另外的安排，而祖父母就成為最便捷、也是名正言順的替代親職，這些隔代教養的時間多數是自孫輩出生就開始，時間可以很長，美國以母系祖輩擔任教養人居多，我國則是以父系祖輩較眾，主要是立法與文化的差異。

二、隔代教養中的孫輩與祖孫關係

現存的隔代教養文獻較傾向將焦點放在對祖輩方面的影響，而對接受隔代教養的孫輩著墨較少，而相關研究也多半呈現負面教養結果，如情緒上的反應，像

是孩子覺得自己是被拋棄、有失落、丟臉、罪惡感、孤立，認為自己成為祖父母生活的重擔，也可能會有發展上的遲滯、情緒與精神徵狀上的異常（如焦慮、憂鬱、重創後遺症）（Strom & Strom, 2000），行為或課業上出現問題（陳麗欣等，2000），或是較沒有成就動機與適當資源、對於自身的期許與生涯發展有限（邱珍琬，2002b），因此可能會淪為社會刻板印象下的犧牲者（Pinson-Millburn et al., 1996; Saltzman & Pakan, 1996）。這些結果可以歸類為情緒（如失落、焦慮、罪惡感）、行為（如社交孤立、出現偏差或學業上的問題）與認知（如認為自己是多餘、祖父母的負擔、對自我期許較低）上的表現，都可能凝聚成為一種「標籤作用」。

Riley（1990）發現許多「接收」家庭功能失常孩子的祖母前來求助，祖孫雙方對於孩子家長的缺席都覺得遺憾悔恨，孩子自視甚低、祖母認為自己的親職工作失敗，代間出現許多誤解、行為設限問題、挫折感、氣憤，甚至將父母的問題（嗑藥、不在身邊、入獄）列為家庭秘密，祖孫彼此的關係也因為祖母認為自己無能處理孫兒出現的偏差行為而衝突增加。國內王鍾和、郭俊豪（1998）以國中生為調查對象，發現隔代教養家庭中仍以父系祖父母影響最大，祖孫之間較多爭執，較常一起做家事與購物，教養模式中若能多對孫輩做反應、祖孫關係會較佳。而郭俊豪（1998）針對一般祖孫關係，發現隔代教養方式中以「管教—反應」一項最能預測祖孫關係，說明了隔代教養的管教方式要能切合被教養人的需要，而孫輩的對應模式也會影響到管教的效果。

Sprey 與 Matthews（1982, cited in Myers & Perrin, 1993）的研究指出，祖父母通常與較年幼的孫輩關係較佳、與較為年長的孫輩關係較差，但是他們是以一般祖父母為研究對象，邱珍琬（2002b）的研究也發現這個趨勢，這也提醒我們必須將教養人與被教養人的發展與需求列入考量，此外還說明了隨著孫輩漸漸成長，其在自主性、獨立、與隱私權方面的需求，可能與祖輩擔心孫輩受外面環境或同儕惡習影響相衝突（邱珍琬，2003；Musil, Schrader & Mutikani, 2000），這些衝突當然也影響了祖孫關係。此外，Creasey 與 Kaliher（1994）對年齡不同孩子的祖孫關係作研究，發現對於年齡愈小的孫輩，祖輩在「陪伴」、提供「工具性協助」、彼此「親密度」、受到孫輩「崇拜」、對彼此「關係滿意度」與「同盟關係」上得分顯著較高，而在「照顧」（nurturance）方面則明顯發現孫女比較能感受到祖父母的照顧關愛，然而這個研究不是單獨針對隔代教養的祖孫關係為重點。

三、隔代教養的優勢與挑戰

隔代教養的祖父母其功能可以是替代不適任父母、補足親職責任，或是減輕父母親職工作負擔，或成為孫輩的角色模範，祖父母對於自己的貢獻與能力有信心、促進代間的和諧與親密，提供孫輩較多的陪伴與安全感，孫輩也會因為不想辜負祖父母的用心而在學業與行為表現上都較為負責自主（陳麗欣等，民 89；Emick & Hayslip, 1996, cited in Giarrusso, Silverstein, & Feng, 2000; Kornhaber & Woodward, 1981; Wilson, 1986; Wilson, Tolson, Hinton, & Kiernan, 1990）；而在面對的挑戰或問題上，隔代教養最常出現祖輩體能上的負擔，祖孫語言溝通與價值觀的衝突，管教態度與技巧的不當，以及文化刺激不足、資源封閉等（陳麗欣等，2000）。

以負責教養工作的祖父母來說，他們對其教養經驗有滿足感、自信、有能力、體會到孫輩的關愛，感覺生命有目標、生活有重心，也很驕傲自己可以提供孫輩安全穩定的持續照顧（邱珍琬，2002b；Baird, John, & Hayslip, 2000; Burton, 1992; Gatz, Benston, & Blum, 1990, cited in Bowers & Myers, 1999; Kelly & Damato, 1995; O'Reilly & Morrison, 1993），甚至會因此而戒除一些不良的健康習慣（Minkler & Roe, 1993）。然而相對地由於隔代教養主要都是家庭結構變動的不利結果，因此祖輩所承受的不僅是經濟、親職責任（包括管教方式與代間價值差異）上的壓力，更多的是心理（與孫輩之間關係、兒女不能執行親職責任）與社會期待（下一代行為與教養成果）下的重重負擔（邱珍琬，2002a/b）；也因為額外的親職工作，負責教養的祖父母必須相對地犧牲自己的需求與自由，感受到負荷過重的責任與罪惡感，擔心自己健康狀況與對孫輩的教養問題，情緒上容易有失望、生氣反應、或是怪人責己，同時社交關係較為孤立，甚至懷疑自己的能力（邱珍琬，2002a/b; Baird et al., 2000; Burton, 1992; Kelly & Damato, 1995; Ehrle & Day, 1994; Minkler & Roe, 1993; Pinson-Millburn et al., 1996; Saltzman & Pakan, 1996）；而教養孫輩若更多、或是祖孫關係原本疏遠者，壓力自然更大（Giarrusso et al., 2000），常常感受到生理與情緒上被掏空的疲憊感（Kleiner, Hertzog, & Yarg, 1998, Towle, 1997, cited in Musil et al., 2000），尤其是在祖輩自身沒有經驗的事物上，也容易與孫輩起衝突（Boksay, 1998, cited in Musil et al., 2000）。許多研究都是以主要照顧人－祖母－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祖母較之母親感受到更沉重的親職壓力（Musil, 1998），Joslin（2000）還特別提醒隔代教養祖輩可能因為職責所在而壓抑或掩飾

了自己情緒問題的徵狀；對於孫輩的學業要求，祖輩常常認為不能發揮督促或協助功能，肇因是本身能力不足與經濟因素不允許（邱珍琬，2003；Strom & Strom, 2000），與一般不必負責教養重任的祖父母相形之下，容易產生角色衝突（管教角色與慈愛祖輩）（Johnson, 1988）。Watson 與 Koblinsky（1997）發現，儘管祖輩都是勞工階級出身，但是對於所擔任的祖職角色很滿意，只是都需要更多新的資訊與角色相關的學習，祖母多半認為自己比配偶在祖輩角色上更成功、對孫輩的影響較大，但是也同時感受到較大的挫敗感。擔任教養責任的祖父母在社會支持、祖職角色的滿意度、親職角色壓力、與生活受挫的程度都明顯高於不擔任教養責任的祖父母（Emick & Hayslip, 1999）。

隔代教養祖孫家庭雖然依賴延伸家庭的協助居多，但是這些協助也會因為親友的有限資源、常常未能提供長期的支持（邱珍琬，2002a/b；Burton, Dilworth-Anderson, & Meriwether-de Vries, 1995），這個結果反應在目前經濟衰退影響下的隔代教養家庭尤然（邱珍琬，2002a/b）！許多祖父母儘管遭受經濟與管教上的諸多困難，卻不知道現存可以提供協助的資源與機構，遑論去求助，當然其本身的資源管道不足與面子上的考量也是原因之一（邱珍琬，民 2002a/b；Strom & Strom, 2000），而其他研究者（如 Minkler, Roe, & Price, 1992）的研究結論是隔代教養無論在教養人自身、經濟與社區資源都是極為有限的，也就是這些重重障礙更增加隔代教養的困難度。

黃政吉（2000）以輔育院之青少年為對象，發現其中 13% 左右的青少年出自隔代教養家庭，教養人多數不識字，生活習慣與年輕孫輩極不同，加上低收入，造成教養工作上的諸多困難。李玉冠（2000）針對北縣低收入戶的祖孫家庭做探討，發現社會標籤、輿論壓力、低社經地位、不談家庭秘密都可能是隔代教養的挑戰，而信仰、親友協助與社福服務等是可以善用的優勢（Haglund, 2000）。

Saltzman 與 Pakan（1996）的研究發現：擔任教養責任的祖父母、孫兒與孩子父母親的互動關係，也會影響到所有的關係人；而父母親的分擔親職責任或是涉入教養程度是否對於隔代教養工作有相對影響，卻是文獻上忽略的，依據邱珍琬（2003）的研究結果發現：不管是祖輩或是孫輩其實都希望父母親可以多多關心孫輩的福祉、可以多擔任一些親職責任。

總而言之，孫輩由於自己家世背景之故、不得不接受隔代教養的安排，情緒上的失落與不安、學業或行為表現上的問題就是可能的不利結果，相關研究針對祖孫關係與隔代教養都是著重在結果的調查，也比較針對教養人的祖父母為研究

對象，本研究希望就受教養孫輩的回溯來看隔代教養，藉以明白隔代教養中的優勢與挑戰。

隔代教養雖然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結果，但是也發揮了一些補足與替代的親職功能，不僅讓祖孫可以有機會發展更親密的關係，祖輩可以貢獻自己能力、為養育下一代效力，有使命感、生活有目標，甚至因為職責所在可以戒除一些不良習慣、作為孫輩的好榜樣，以及善用延伸家庭或是社區系統發揮互助支持的功能；然而過多的壓力與責任（包括經濟與教養工作）、導致身心俱疲，也因此犧牲掉祖輩自己的自由與生活，甚至會因為角色衝突、讓祖輩與孫輩之間的關係因此緊張或冷淡，孫輩由於自己家世背景之故、不得不接受隔代教養的安排，情緒上的失落與不安、學業或行為表現上的問題就是可能的不利結果。

綜上所述，相關研究針對祖孫關係與隔代教養都是著重在結果的調查、重在單一層面（如受教養孫輩或祖輩觀點）的解釋，雖然涵括了正面與負面的結果，但是其深度顯然不夠，因此本研究希望自另一個角度來看隔代教養，希望可以自親身經驗的故事中去了解隔代教養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其實際影響力為何。文獻上可以歸納為隔代教養的助力包括祖孫可以發展更親密的關係，讓祖輩可以在貢獻自己能力、為養育下一代效力，有使命感、生活有目標，甚至因為職責所在可以戒除一些不良習慣、作為孫輩的好榜樣，以及延伸家庭或是社區系統發揮互助支持的功能；需求或挑戰方面包括過多的壓力與責任（包括經濟與教養工作）、導致身心俱疲，也因此犧牲掉祖輩自己的自由與生活，甚至會因為角色衝突、讓祖輩與孫輩之間的關係因此緊張或冷淡，孫輩由於自己家世背景之故、不得不接受隔代教養的安排，情緒上的失落與不安、學業或行為表現上的問題就是可能的不利結果。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本研究乃採用敘事研究方式去探討隔代教養經驗與其可能的影響，由於研究者之前所做的研究雖然涵括了不同年齡層被教養的孫輩（如學步兒、國小、國中），但是這些僅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而言，沒有對隔代教養的影響力作較長時間的了解與推演，因此希望藉由一位成年的受教養孫輩、透過回溯與敘說故事的方式，將其接受隔代教養經驗做整理與分析，以增加研究文獻的豐富性。

敘事研究是直接接觸經驗的便捷之道，研究者不只可以從第一手敘述故事中獲得第一手資料，還可以看到敘說者自己建構的生命經驗與意義(Brickman & Rog, 1998)，而最主要的是可以看到其中的「變化」(Clandinin & Connelly, 2000，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8、10)。而研究者所扮演的秘書與催化員角色，在敘說者陳述故事時適時發問、也做釐清(Conle, 2000)。由於敘說中所涵括的資料，其重要性由敘說者自己決定，其敘事情境與時間脈絡都有跡可循，甚至可以看到敘說者對於事件的詮釋與反省(Connelly & Clandinin, 1988; Grumet, 1990)。Riessman (1993) 提到在敘事中故事敘說者試圖把一些經驗經由敘說方式重新將經驗呈現，而其中包含五個層次——關注此經驗、訴說此經驗、轉述此經驗、分析此經驗，最後是閱讀此經驗(引自胡幼慧，1996，p.160)。也就是敘說者自己會就主題(或經驗)做優先次序或是重要事件的敘述與組織，然後研究者便可以從這些敘述中去了解敘說者對於此經驗所架構的意義。

敘事研究有許多類型，其中我比較鍾情的是生命史的研究，當然也可以依據一個主題要求研究參與者作相關的敘說；生命史基本上是一個縱貫研究，它關切的是生命歷程的時間序列、以及重要事件的影響，所以除了時間安排之外，還包含了時空位置、相關生命、與個人力量等要素(引自王麗雲，2000，p.268)。

研究者與鍾琦(參與者)是在一次演說中碰面，因為當時的講題是有關親職溝通，研究者提到過隔代教養的問題，會中休息時，鍾琦特別來致意，談到與祖父之間的一些相處經驗，引發研究者一探究竟的興趣，因此當時就曾經請教過若有機會做相關研究，可否請其擔任資訊提供，鍾琦慨然應允，也造成了這個研究的相會。研究者在九二年暑假藉由四次訪談的安排，與鍾琦在辦公室與咖啡廳分別做了二至三小時的面談，訪談過程中做全程錄音、輔以訪談札記與反思紀錄，後來逐字稿完成，也以郵寄方式請鍾琦對於內容的正確性提出檢視與修正，此外還以電話方式就背景資料部分做了詳細了解與確認。由於資料分析方式基本上有「類屬」(按照意義主題作分類)與「情境」(按照時間敘或是意義相關主題作敘述)兩種方式，(陳向明，2002，p.196)。本研究者所採取的方式是以敘事故事時間先後為主、以及根據訪問內容所篩選出的意義主題作分類；資料分析是以紮根理論的編碼方式進行類別、相關概念整理，然後以不同主題依序呈現，引述文括弧內為訪談日期。

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鍾琦今年三十六歲，女性，在北部從事貿易工作。她有五位手足，上有二姊一兄、下有一弟，目前都在自己專業上有相當不錯的成就；父祖都曾擔任公職，父母親因為在她十歲時分居、然後離異，所以自小是跟著祖父、父親長大，父親因為負責養家工作，許多的教養職責都在無形中轉移到當時六十多歲的祖父身上，由於祖父在六十七歲喪偶、加上後來父母仳離，彷彿是沒有機會讓祖父去哀傷、就必須承接教養孫輩的責任。鍾琦排行么女，下尚有一弟，在兄姐的協助照顧下（長姊當時唸國三，十五歲），雖然不需要擔負太多的家務責任，但是也必須因此而學習與人合作。鍾琦回想自己受到祖父照顧的時間很長（從十歲到自己負笈外地，約有十年時間），主要是因為當時自己年紀尚小，在頓失母親的依賴情況下，的確不知所措，當時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為什麼就這樣沒有了母親，然而父母親之間長年的不和、到後來離異做結，讓她覺得好像是自己的錯，後來這個結解開了，由於那時兄姊們都不談論父母親之間的事，彷彿成為一種不能言說的家庭秘密，因此她也無從得知大家的心境。許多與祖父相處的經驗也在訪談中一一出現、並受到檢視。

一、母親離家後的變動

母親離家之後很久，父親才去辦了離婚手續，在這之間家裡面發生了很多事，包括祖母因為癌症往台北治療，家庭經濟的困窘，以及家事與角色的重新分配。祖母與母親之間的不和，是一種傳統婆婆與現代媳婦之間的抗爭，差異的不僅僅是個性與價值觀而已，還有許多女性對於自我、家庭與生活期許的矛盾。母親的出走，也讓病榻中的祖母自責很深，認為自己也要負部份的責任，但是這些似乎也無法挽回現況，孩子們慢慢調回自己的生活步驟，雖然後來母親曾經偷偷回來探望，當時最難過的是小弟，但是鍾琦不太記得自己的感受了，可能也是陪著哭而已。

「（母親離家後）我沒有聽過阿公抱怨母親或是說母親不好的什麼話，這一點倒是我觀察到（很）重要的一點，我後來也聽姊姊們說阿公就是這樣承擔下來，沒有對我媽的離開做任何責難。我想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雖然沒有了母親，但是並不表示我們是被拋棄、或是有錯的。我看阿公

從一個享受威權的角色，到一個必須一切重新學習的照顧者，想起來還是會很感動。」(92.8.5)

「因為他雖然什麼都不會，但是很熱心協助，大半時候（幫忙）的結果並不是很好，可是我有看到那份心。」(92.8.5)

「我爸每天上班、有時候出差，都是晚上六點多或更晚才回到家，因為他有時候還要去黃昏市場買第二天的菜。我們早上出門會看到阿公，傍晚回來也是先去菜園向阿公稟報我們回來了，所以看到阿公的機會比看到爸爸的機會要多。」(92.8.14)

「我們小時候生活不富裕、甚至算是貧窮。阿公退休很早，當時的公務員收入並不好，聽說阿公的退休金沒多久就花完了，只是因為還有一些祖產，所以可以靠著收租來過生活，後來連土地也變賣了讓叔叔們去國外唸書。我覺得阿公的這些決定是很好的，因為他不重視金錢、也願意培養孩子唸書，等於是讓孩子可以從事農業或公職以外的發展。我爸在日制高中畢業之後就開始工作，他也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被關了三天，後來僥倖活命回來。媽媽離開之後，家裡頓失依靠、一切都要從頭來。我記得阿媽當時臥病在床、後來去台北做長期治療，阿公當時也要常跑台北，聽嬸嬸說阿媽一直為了媽媽離家的事很自責，可是我覺得她們（阿媽與媽媽）之間不只是婆媳問題而已，還有傳統與現代的抗爭，當然我媽的個性的確與阿媽的隱忍保守是相差很多的，所以才有這麼多的爭執在。」(92.8.5)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是自己來，可能是沒有意識到它的困難度，後來就不行了，因為阿爸要上班、六個孩子要唸書，於是就請住在附近的姑姑替我們煮飯，(姑姑)其實純粹是道義上的幫忙，她是可以拒絕的，但是(她還是來了)，姑姑性子急、與阿爸有不同意見，兩個人見面常常吵架，也可能是我們太依賴了吧，後來姑姑索性就不來了，因為她覺得自己不被感激、還被嫌棄，後來就換成是表姊來協助了。阿公也開始想要幫忙，尤其我們家孩子這麼多，以前媽就說她養了一群蝗蟲，一下子飯就吃光光，好像來不及供我們吃！」(92.8.5)

在母親剛剛離家後的這個階段，家庭似乎還在重整之中，不只是因為家中角色要重新做分配，甚至許多事務的不熟悉也顯示了母親在家中的重要地位，許多人甚至是搞不清狀況，所以後來是向外求助、這也是父親願意承認與接受母親離家的事實的開始，有鄰近的延伸家庭成員涉入之後，又經過一段折衝協調，大家

才慢慢穩住步調、知道自已的位置。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一個家庭的結構少了一個成員，每個人都必須做調整的動作，包括家事與角色的重新分配，也要動員到附近可用的資源（包括延伸家庭）。

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擔心，只是家中食指浩繁，以前是母親會偶而賣賣菜園種的菜、或是自己出去打零工、賺取一些錢來貼補，現在失去了這個人力，也發現家中要處理的事務突然變多了，家中成員的張惶失措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父祖都必須率先將這些痛苦吞下、喬作堅強。鍾琦看到阿公的笨手笨腳、但是卻很熱心想要幫忙的情況，也可以體諒他們的生疏、能力不逮，甚至覺察到底下深厚的關愛。祖父對於母親的出走沒有惡言加諸，也不說一句重話，也許就如鍾琦之前所說的父親怪罪祖父的擅自作媒，然而鍾琦後來透露的訊息是：即使是阿公做的媒，也是父親自己願意喜歡的，所以不能拿祖父作代罪羔羊。鍾琦後來為這些理不清的「冤頭債主」做了一個解說：「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父母親，可是可以選擇我們對應的方式。以前我很（生）氣的時候，也會怪我爸娶錯太太，後來長大了當然知道是無聊無稽的；只是當我們在抱怨阿爸，阿爸又怪阿公的時候，阿公都沒有反駁的餘地，好像他是必須承擔所有的錯誤，這真的是不公平的！」（92.9.3）。祖父的不出惡言，給鍾琦很大的影響，也讓孩子不需要在父母親的私人情緒鬥爭中、有「選邊站」的難堪，所以鍾琦說自己沒有覺得「被拋棄」或是「做錯了」。

二、阿公的改變

祖父、爸爸與六名子女的生活打拼自此就展開。這樣子協調了很久之後，才慢慢有個雛型出現，也就是孩子們也開始分擔責任、自己有自己的應該負責的部分，從慌亂、不知所措，到每人各司其職，這樣子磨磨蹭蹭，也是好一陣子才步上軌道。鍾琦說之前聽說阿公有賭博的習慣，偶而會在半夜才回家，但是這都是他退休之後的事，後來分擔教養工作之後，她就很少聽到阿公賭博的事，她說也許是因為家境不允許，而阿公也沒有太多時間花在這些社交生活上，因為他一大早就起來種菜或是澆肥，有許多農務的事要做，然後回來看報紙、吃個飯、睡個午覺醒來，又再去菜園工作，傍晚之後，孫子們一一回來，阿公就會招呼洗澡、寫功課，會罵看電視卻沒把作業寫完的人，或是去喊出去玩、天黑不知道回家的人，每天就是這樣固定生活；後來是每個人放學回來都有固定的家事要做、也變得較為主動，阿公就比較少罵人了，而鍾琦也是這樣覺察了阿公的改變。阿公的教養

工作包括：熱冷飯菜、喊孫子起床、載孫兒上下學、督促寫功課與考試準備、查看成績、與照顧孫兒洗澡吃飯。

「你想一個很大男人的人，一下子遭遇喪妻、媳婦離家的變故，真的是很大的打擊，尤其我阿爸也有自己的抱怨，他認為是阿公作的媒、必須為這樣的後果負責任，所以也許是基於罪惡感或是責任吧，阿公就必須也參與整個家裡的運作。我記得他一向起得很早，會到我們房間叫我們起床，有時候我們賴床，他就會用（抽）竹掃把（一根）伺候，而且毫不留情，我記得阿爸也挨過他的竹掃把，真是很痛！後來我們就會自己起床了。不過我們連星期天也不能貪睡，雖然不是像平常一樣六點起床，但是頂多也只能睡到七八點。」（92.8.14）

「其實阿公有一些習慣不錯，像是每天看報紙、作體操、去菜園工作，我記得他會叫我們跟他一起作體操，每次當他做蹲下來的動作時，都會照例放個響屁，我們都會忍不住笑。」（92.8.14）

「有一次阿公煮菜，竟然是直接就把過年吃的火鍋（鍋子）放在煤氣爐上加熱，當時我們聞到異味，才趕緊去搶救下來，要不然真的很可怕！他熱菜的方式是直接把需要熱的菜全部放在一個鍋裡，我們覺得噁心！他煮過青菜，但是都糊糊的、黃黃的，看了就不想吃，味道像餿水，他還會生氣，後來是他自己也嚐過了、覺得不對勁，後來阿爸才請人來幫忙的。」（92.8.14）

「阿公會載我跟弟弟去上學，用他的腳踏車，他七十多歲了踩腳踏車還是很有力氣。那時候我坐腳踏車也不知道可以抱阿公的腰，他也只是叫我抓緊，所以我就用力抓著座位（前面）的鐵（條），很緊張、怕自己掉下來，但是有阿公載、坐車，其實是當時（的）小朋友很少享受到的。」（92.9.3）

「阿公生病（癡呆症）以後，我更發現他的熱切照顧的心，甚至會感受到他的『虧欠』。因為聽姊姊說他們住叔叔家，阿公就會把一些好吃的都留下來給他們，也會問孫子回來沒有？有一次叔母就很生氣問阿公『平平都是孫子，為什麼只問我們、卻不問她的孩子回來沒有？』」（92.8.14）

鍾琦所看到的阿公是從以嚴峻著稱、嘗試新角色的慌亂無能、到慢慢拿捏出來分寸，一個大男人、到一個關愛的祖父，的確是很大的轉變，而鍾琦對於阿公的角色轉變還不是很清楚，因為之前沒有同他有太親密的接觸，可能是因為阿公的外表與處世方式的不苟且、嚴謹使然，這其實也讓鍾琦在後來回憶時特別記得

阿公「堅強的溫柔」。

阿公經歷了兩次重大生命事件，但是都沒有人可以分擔，甚至可以說是沒有時間讓自己悲傷。鍾琦說她印象中祖父手中都是有活兒幹，很少閒著，就拿看報紙來說，可以一看再看也不嫌膩，幾乎沒有看過祖父發獸的時候；也許祖父也是害怕自己一旦閒下來，就會有時間讓一些否認與要逃避的事情佔滿思想的空間，可以藉由工作來度過悲傷或不順意彷彿是她們家的傳統。祖父的愛在負笈外地的兄姊敘說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印證，鍾琦在提這些往事時忍不住落淚，讓她難過的是：祖父生病了還這麼掛心孫兒，而這些簡簡單單的生活細節，在在都突顯了祖父對於自己親職工作的投注與承諾。

三、阿公的庭訓

鍾琦認為阿公可能是因為自己受了高等教育（日制高中畢業），所以也希望把這些觀念傳承下去，在反思阿公的平日教訓與行為要求裡，她發現「學業」很重要，而「公平正義」也很重要，不拿不該屬於我的、也就是說人要守本份。

「我記得有人送禮來，小孩子是不能去拆開的，因為阿公說有些人送禮裡面會有其他東西（像金錢），或者是別人有求於我們，除非自己做得到、但是還是不能收不應該收的禮物，萬一自己辦不到、又收了禮，這樣子是很不好的。」（92.9.3）

「讀書吧。阿公會要求我們除了寫功課、還要花時間看書，但是家裡面那時候幾乎沒有什麼課外讀物，阿公也不會想到這一點，只是叫我們看書，應該是看教科書吧。還有阿公會問我們知不知道（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主要是他看完報紙之後，會要我們知道一些週遭世界的訊息吧，他也許是希望我們也可以看看報紙、增廣見聞。」（92.9.3）

「我記得有人曾經因為受到阿公的照顧，常常過年過節來家裡拜訪，但是阿公很少收禮物，總是叫阿爸退回去，有時候我們就看見阿爸追著客人後面跑。我弟曾經有一次擅自拆開了一個禮品包裝，給阿公罵得很慘，所以我們學到的教訓就是不該拿的絕不能拿，以前是因為怕阿公生氣，後來認為是自己可以堅守的原則。」（92.9.3）

「（還有）不做不食。就是說沒有花勞力就不能享受。這一點我後來有質疑，因為阿公以前賭博不就是不花勞力嗎？但是他在生活上卻是要每天工作，他認為這樣吃飯才好吃，像他每天去菜園裡工作，草好像都拔

不完，而菜是每天都需要澆水的，可以從日出忙到日落，有時連午覺都沒得睡。」（92.8.14）

「我姊在小學時候偷過阿媽的錢，後來阿公知道，也沒有對她做處罰，只是說以後需要錢、告訴他就可以了。」（92.9.3）

「我印象中阿公比較沒有男女的分別，像我姊是老大，書也唸得可以，所以阿公會器重她。」（92.8.14）

「我覺得阿公是一個很堅強、有韌力的人，他的一些觀念是很開放的，包括他對於孩子孫子教育的堅持，寧可傾家蕩產、也要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他還把土地捐出來（給國家）做鐵路，我想我的金錢觀也是從他這裡來，不必把錢看得太重，有比金錢還更重要的東西。還有他因為每天閱讀報紙，所以對於週邊發生的事情很注意，也會問我們的意見。」（92.9.3）

鍾琦的祖父給她的教育主要是身教居多，不太以說教的方式呈現，像是拆禮物的規定、不拿不該拿的東西似乎是鍾琦自己的引申，而這之中也傳達了「公平正義」的意涵。很有趣的是唸書與「不做不食」，祖父似乎只知道督促孫輩學習很重要，但是卻無法提供可行方式，而即使自己已經退休在家多年，卻還是每日忙碌，然後才會進食，這也許與當時的農家子弟傳統有關係。對於孫輩道德行為的約束，鍾琦的祖父不會用嚴厲的懲罰，這樣的說明與理解不啻是孫兒學習的模範，也點明了祖父在教育上所關切的議題：要求誠實，要去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研究者特別問到祖父的性別刻板印象，但是鍾琦認為沒有這麼明顯區分，祖父似乎是以個人的才能為依據，不會因為孫子或孫女而有不同的期待或對待。

四、阿公之間的關係

鍾琦談到與祖父之間的關係似乎有幾個階段：從最初的害怕疏離、慢慢接觸與了解、到後來的每日相處與觀察後的親密，她發現祖父的確有改變，可以說是環境促成、也可以讓她看到祖父的不同面向。

「以前我超怕我阿公的，也許我們家附近的小孩都是如此，因為他總是理光頭、而且不太有笑容，吼起人來很恐怖，我們當時是聽到木屐聲就會嚇得逃跑！後來是阿媽過世之後，我跟公弟就被規定要陪阿公睡，因為他一個人睡在另一個房間，我每次都很擔心輪到我的時候。但是也是開始看到阿公不一樣的地方，他不太說話，但是會注意我的被子蓋好沒，有時候要下床去上廁所，他也會陪我走去，只是我還是會害怕，我後來也忘了是什

麼時候開始解除了這個規定。」(92.8.14)

「大姊是最先對阿公改變印象的，她以前就膽子大，也會不服阿公的訓話，但是我們知道阿公很看重她。是後來她上大學之後，那時阿公搬去台北叔叔家住，有很多機會跟阿公接觸，她會跟我講很多發生在阿公與她之間的故事，我也開始了解阿公的另一面。阿公其實是很幽默的，他比較不像我爸那樣親和、但是有機會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對話，像是她跟姊姊去公園散步，人家問起他的年紀、他會『謊報』，姊姊問他為什麼要說謊？他就很調皮地回道『人家又不會去問（證實）』。」(92.9.3)

「我很喜歡跟阿公談話、跟爸爸反而比較少。他晚年的時候我們會固定陪他去散步，他喜歡握我們的手走路，我還跟他開玩笑說他那麼色，他也是笑笑、不會生氣，有時候我們還會牽手這樣搖啊搖、像小孩子一樣。」(92.9.3)

鍾琦與祖父之間的關係，可以有幾個階段的發展：從年幼時隨著兄姊的懼怕與逃避，後來母親離家之後的混沌、複雜，到增加相處機會的漸漸親密，最後是看到也解讀阿公關愛的言行舉止，是呈現陌生疏遠到了解親密。祖父晚年像孩子般的表現與幽默，也讓孫輩看到祖父的不同面向：「(我看到了)人的改變是可能的，像我祖父的案例，就讓我深深體會到即使大環境不友善，人還是可以有選擇的，要變的可能不是環境而已，而是自己思想的方式與方向，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做改變、或是沒有警覺到改變的必要性，(縱使)環境改了、人還是一樣！」(92.8.27)

五、阿公過世之後的感慨

鍾琦對於阿公的緬懷與感謝是在阿公過世之後才出現，因為阿公晚年時患有老年痴呆，但是家人沒有注意他的變化、後來也不太明瞭這個病症的癥狀，所以後來算是意外死亡。鍾琦認為阿公的愛是用行動表示，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說，而這樣的示範，也讓她對於他人的情緒感受特別敏銳、也能夠反應。

鍾琦回想起阿公以身作則的一些生活作息，感受到行動真的比說教的影響力大，他的固定作息、讓自己一直在動在做事，是因為他擔心閒下來的時間無法打發或是思考不知落在何處。後來癡呆症的明顯癥兆卻讓全家都害怕恐慌起來！阿公去世的情形也是稍後才知道，因為那時候學校在期末考，老爸竟然因此沒有立刻知會孩子們這個消息，所以孫輩無法及時趕到醫院見彌留的祖父；雖然根據父

親的敘述是「阿公一直沒有醒過來」，但是還是沒有將這個祖孫關係做個結束動作，後來也成了一個「未竟事業」(unfinished business)。

「我想阿公的做法，讓我覺得『日子總是可以熬過去』，家是每個人的責任，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他(她)的責任與影響，即便是不完整的家，也是可以過得很完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阿公阿爸這樣的身教，我也學不會這麼多能力。」(92.8.14)

「阿公很少享受過，我上大學的時候，他當時已經有點老年痴呆了，但是我們卻不知道要怎麼幫他，只是覺得他很奇怪，因為他的許多情況讓人不能理解，像是他會說有人要抓他去打仗了，就自己把內褲內衣穿了一大堆、要我們打電話去問車班來了沒？要不然就是去我們房間一一開門去巡視，我們覺得不勝其擾，後來我才想到因為他害怕、也怕寂寞。當他已經需要人餵食、自己不知道吃過飯沒有時，我才有一點害怕。後來他就趁我們不注意，自己開門去外面坐車，這樣子失蹤了兩個多禮拜，後來是在一家醫院找到他，他當時已經昏迷很久，聽說是給機車撞了、給社工人員送到醫院，但是因為當時沒有全民健保，醫院只是收容他、但是沒有做積極治療，從我們發現他到他過世，只有短短一個多禮拜的時間。」(92.9.3)

「阿公很愛我們，雖然他不會說，但是我聽叔叔嬸嬸他們說阿公凡事都會想到我們這一家，只要有好東西也會吩咐叔叔們給我們寄來，嬸嬸說叔叔還因此認為阿公偏心。」(92.9.3)

「我記得有一次跟阿公去散步，他還摸了一下我的屁股，我告訴他我是他的孫子、不可以這樣，但是他說他好像回到四十幾歲的時候。我覺得不對勁，但是不知道他是生病了；後來是發現他澆菜把菜澆死了，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很難過。我當時有一位高中同學常常來家裡玩，有一次帶幾個菜包來，阿公就吃著說著、也邊問人家一些學校的事，後來五個菜包全給他吃完了，他還問同學來家裡做什麼？而且有一連問之前問過的事，還追問菜包的去向，同學覺得很好笑，我是莫名其妙，可是也感受到一些說不出(來)的悲哀。」(92.8.27)

「姊姊說在台北唸書的時候會去看阿公，有一次阿公還把叔叔給他吃的麻薯、自己捨不得吃，用衛生紙包著等到叔叔不注意的時候就拿給她吃，當時衛生紙與麻薯幾乎都合為一體了、(看起來)有點噁心，想到阿公這樣關愛自己，心裡很難過、忍不住流下淚來，但是她還是順阿公的意吃了下去，

阿公還急著說『難吃就不要吃』，但是她說不出來（她的感受）。我知道阿公的時代，很少說愛，也不太會用口語表達自己的關心，這樣其實也讓我們對於別人的情緒或是表現會很敏銳，因為我們知道關愛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現的，只要我們接收得到。」（92.8.27）

「（我們）會有遺憾，因為好像都是記得阿公的付出，我們的無能與無知，我後來（在阿公過世後）都沒有夢見阿公，其實是很難過的，現在即使跟家人會談起阿公的事，也是悔恨比較多吧。」（92.9.3）

鍾琦對於阿公過世有許多的遺憾，認為自己好像都還沒有機會回報、阿公就撒手人寰，甚至連夢不到他都好像是很大的遺憾！從鍾琦對於阿公一些事件的記憶，就可以知道她的確是一個敏銳又細膩的人，而這個能力有時候用在與人相處中也有一些負面的結果，包括太體諒別人、卻也犧牲了自我的堅持。鍾琦提到自己的客家話許多都是阿公逼她學的，因為阿公會跟她以客家話做對話，鍾琦也說家人是很肯定她的方言能力的，到現在她自己也有了下一代，也會要求孩子保留說客語的能力，這一點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傳承。阿公雖然不善言詞，但是卻也讓孫輩感受到暖暖的關愛，不管阿公是基於悔恨或是彌補，鍾琦都認為與阿公相處是一個很棒的經驗，不只讓她可以明白關愛的形式與方式，也可以看到一個人改變的潛能。

伍、綜合分析

以故事敘說的方式談隔代教養，的確可以發現許多深層的感受與反省，也讓研究者可以從敘述的脈絡中去發掘許多受教養人的內心世界。鍾琦在演講會中聽到一些研究提到隔代教養的負面結果，就有不同的意見，她認為是因人而異、不能一以論之，在許多人的眼中也許兩個大男人當家、沒有一個女人持家，可能對於孩子的影響較為負面，但是鍾琦願意提供自己本身的受教養經驗、作為一些迷思的釐清，這一點倒是很值得欽佩！「就像有人提到孩子行為出現偏差，很容易就歸結到『出自於單親家庭』，我就很不服氣，因為我也是來自單親家庭，但是不要把那些標籤來套我！我還是可以長得很像我自已、很有發展！」（92.8.14）這其實也說明了許多結構不完整的家庭（包括隔代教養），極容易淪為社會標籤下的犧牲者（Pinson-Millburn et al., 1996; Saltzman, & Pakan, 1996），相對地也形成了這

些教養人與受教養人更大的壓力，包括不能出差錯、甚至需要比一般家庭的雙親與孩子更努力，才可以獲得認同！鍾琦的手足能夠在社會與工作上有穩定的成就與發展，也不能擺脫這樣的一個標籤化作用後的「反挫力」吧。

對於鍾琦與祖父之間的關係原本疏遠，研究文獻的結果是會對擔任親職工作者造成更大壓力（Giarrusso et al., 2000; Musil, 1998），但是在鍾琦的陳述中，即使在初時有壓力，但是在祖父的努力與孫輩的配合下慢慢化解。也因為分擔教養工作，鍾琦的觀察是祖父賭博的習慣沒有再持續（Minkler & Roe, 1993），這也許就是責任使然、或是限於家庭財務現況不得不爾。祖孫關係通常是依孫輩年齡有親疏不同（邱珍琬，2002b；Sprey & Matthews, 1982, cited in Myers, & Perrin, 1993），但是在本研究中適得其反，祖孫關係因為孫輩行年漸長而有更親密的趨勢，這就必須考量到教養者與受教養者之間彼此協調與滿意的程度，在鍾琦的案例中，由於祖孫對於自己面臨的處境有共識，以及家庭教育的薰陶約束，促使其祖孫關係可以穩定成長。而是以祖父在教養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與提供的協助來說，比較明顯的是陪伴（共渡難關）、工具性協助與照顧（載去上下學、日常生活基本的需求滿足）、與同盟關係（對抗社會壓力）三者（Creasey & Kaliher, 1994）。

鍾琦祖父在教養功能的優勢是：親職工作與角色的彌補（或補足）、減輕父親的親職工作負擔，是孫輩的角色模範，也對自己的貢獻與能力有信心，提供了孫輩陪伴與安全感，而孫輩因此在學業與行為表現上都較為負責自主（陳麗欣等，2000; Emick & Hayslip, 1996, cited in Giarrusso et al., 2000; Kornhaber & Woodward, 1981; Wilson, 1986; Wilson et al., 1990）；而在面對的挑戰或問題上，雖然親職工作增加了祖輩體能與心理上的負擔，但是在溝通與價值觀方面沒有太大衝突、或是管教態度與技巧不當的問題，這些與若干研究者（邱珍琬，2002b；陳麗欣等，2000）所得結果不相符。

雖然鍾琦祖父與孫輩間可能存在著一些代溝或價值觀的不同，但是沒有看到衝突浮凸檯面，以 Boksay（1998, cited in Musil et al., 2000）的結論是發現祖輩在自身不熟悉的經驗上，較容易與孫輩起衝突，但是也許是祖父認為「日子總是可以熬過去」的樂觀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祖父即使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下，沒有特別的負面情緒反應出現，甚至還「吸收」兒子對其的責難，可能是因為前述的樂觀哲學，也可能如 Joslin（2000）所提醒的祖輩掩飾情緒、擔心影響家人的動機使然；雖然對於孫輩的學業要求，鍾琦的祖父不能發揮太多督促或協助功能（邱珍琬，2003；Strom & Strom, 2000），但是手足之間的合作也補足了這個缺憾；研究

文獻也提到隔代教養祖輩較容易有管教與慈愛的角色衝突 (Johnson, 1988)，在鍾琦的案例中，由於祖孫關係是從疏遠到親密的發展，因此角色的衝突沒有太明顯。

一般說來，隔代教養家庭求助於延伸家庭的協助居多，在鍾琦的案例中也不例外，雖然這些資源有限、提供也只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後來由鍾琦的兄姊們接手）（邱珍琬，2002a/b；Burton et al., 1995），但是在整體操作上並沒有造成青黃不接或阻礙太多的情況，反而是讓整個家庭在危機處理之後、開始了自己的系統運作。

在隔代教養中特別可以看到 Erikson 所謂的「傳承」與「生命延續」（Erikson et al., 1986）的意涵，而在鍾琦的回溯裡，的確也看到文化傳承與持續的影子，祖父的生命雖然只是以片段記憶的方式存在（Rosenblatt, 1999），確有著不可抵擋的影響力！生命的意義似乎在困挫中展現了另一番美麗風貌！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鍾琦與兄姊弟弟在祖父與父親的教養下成長，由於是母親離家，所以也讓這個家蒙上陰影，父祖在事情發生之後避而不談，也曾經讓鍾琦自責，但是後來也因為祖父的不說惡言中傷母親的修養，讓鍾琦不會對自己有莫名的罪惡感。鍾琦與兄姊弟弟五人的成長，有著對祖父的共同記憶，也在彼此扶攜之中，慢慢從沒有母親的失重到調適與安頓的生活。鍾琦認為祖父是一個不擅言詞的傳統男子，甚至在遭受喪妻、媳婦出走的雙重失落之後，依然可以咬緊牙關、硬撐下去，也改變了自己一向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大男人作風，鍾琦目睹祖父努力嚐試分擔家務、協助親職工作，也在他的行動中意會、感受到濃濃關愛，而對於祖父的觀感從嚴峻、不知所措、到投注教養孫兒的「母職」角色的蛻變歷程，她也學到了許多人生真諦與智慧。祖父後來是在外出車禍後昏迷過世，沒能看到祖父醒來、甚至彌留時最後一眼，對鍾琦來說都是未了的心願，所以她會特別提到自己「夢不到」祖父的哀傷與遺憾。

雖然鍾琦的案例是隔代教養的模式之一（祖孫三代同堂，祖輩負有教養責任），但是也在她的故事中，略窺隔代教養的一些優勢，包括：祖父協助親職工作、

或減少親職工作的負擔，祖父對於家族文化與價值觀的傳承，祖父作孫輩角色模範與學習對象，以及祖孫間的情感聯繫與依賴；而孫輩手足之間也因為必須做角色分配與重整，所以培養很好的默契，也訓練了許多能力的發展，在學業與成就的表現上也不輸人、自主性強。在挑戰方面則有：孫輩早熟與未能享受童年的遺憾、經濟與工作責任負擔、管教問題、兒輩情緒的出口與責難。

二、建議

隔代教養原本是可以補足親職功能的不足，也是中國家族系統很重要的一種功能，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隔代教養竟然成為一種家庭模式，而且多半是屬於弱勢族群的一環。本研究中的案例，雖然印證了隔代教養一些優勢（如補足親職功能、家族價值傳承、代間情感聯繫等），但是家中少了一個親職角色，卻需要家庭系統其他成員分擔起缺席親職的工作，雖然突顯了家庭系統的彈性，但是不夠強韌的家庭可能就會有不同結果產生。隔代教養的挑戰就是需要面對的問題，而如何因應就是智慧；親職功能失常是一個不可言說的家庭傷痛與秘密，不敢向外求助，家中成員的心理與實際生活壓力自然增加，然而家庭的強度也因為共同的目標也變得更具像。然而，是不是每個隔代教養家庭都可以有這樣的結果？出身自隔代教養家庭的成員是否因為社會標籤之故，而需要更大的勇氣與心力去應付現實生活的挑戰、甚至表現得「超乎尋常」？

本研究雖然以敘事方式做個案的研究，以彌補現存文獻的不足，但是由於只是個案，因此其推論必須十分謹慎小心。最好的方式當然是針對不同年齡族群做橫斷或是縱貫研究，可以得到較為客觀與公允的資料。隔代教養有其優勢與挑戰，雖然在「不完整」建構下的家庭會出現角色不足、或是功能未能適當發揮的困境，然而也因此可以看出一個家庭面對問題與挑戰時的「彈性」，很可惜的是：儘管這些困境已經陸續在研究文獻中出現，但是卻缺乏較為具體、系統化的一些補足措施，包括社會福利的修正與增添（真正照顧到弱勢族群）、親職教育的必須性與執行（補強親職執行功能）、協助祖輩紓解經濟壓力與管教負擔（如託管制度、社區互助協助）、協助系統（如諮商與課業服務）等，這似乎也反映出隔代教養縱然已經漸成一種家庭結構趨勢，但是卻乏人注意到日漸嚴重的延伸問題。倘若要消除隔代教養的社會標籤（如同對單親家庭的偏差看法與歸因一樣），必須讓有效的社會公權力介入，才可以展望更有效的親職功能、有希望與前瞻的下一代！

參考文獻

- 王麗雲（2000）。自傳／傳記／生命史在教育研究上的應用。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
質的研究方法（pp.265-306）。高雄：麗文。
- 王鍾和、郭俊豪（1998）。祖孫家庭與親職教育。**學生輔導**，59，50-61。
- 李玉冠（2000）。**隔代教養祖孫關係之探討——以台北縣低收入戶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縣。
- 邱珍琬（2002a）。隔代教養祖孫需求初探。**嘉義大學九十一學年度師範院校學術論文發表會**，2057-2085。
- 邱珍琬（2002b）。台灣南部原住民隔代教養初探。**屏東師院原住民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46。
- 邱珍琬（2003）。**變化中的家庭（一）：隔代教養——親職管教特色與需求**（手稿，未出版）。
- 吳佳蓉（2002）。**隔代教養兒童與非隔代教養兒童學校師活適應之比較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的分析與寫成。**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胡幼慧主編）（pp.159-170）。臺北：巨流。
- 陳向明（2002）。**教師如何作質的研究**。臺北：洪葉。
- 陳建志（1998）。族群及家庭背景對學業成績之影響模式——台東縣原、漢學童做比較。**教育與心理研究**，21，86-106。
-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我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之分析（上）。**成人教育通訊**，2，37-40。
- 陳麗欣、翁福元、許維素、林志忠（2000）。我國隔代教養家庭現況之分析（下）。**成人教育通訊**，4，51-66。
- 郭俊豪（1998）。**祖孫家庭相關因素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黃佳儀（2003）。**隔代教養家庭學童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灣北區高年級學童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黃政吉（2000）。社會變遷中隔代教養與少年非行之關係實務調查研究。**警學叢刊**，31(3)，97-109。
- 簡文元（1998）。原住民家庭教育現況探討。**台灣教育**，576，45-49。
-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臺北：心理。

- Baird, A., John, R., & Hayslip, B. Jr. (2000). Custodial grandparenting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 focus group perspective. In B. Hayslip, & Golberg-Glen, R. (Ed.),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pp.125-144). NY: Springer.
- Bowers, B. F., & Myers, B. J. (1999). Grandmothers providing care for grandchildren: Consequences of various levels of caregiving. *Family Relations*, 48(3), 303-311.
- Brickman, L., & Rog, D. J. (Eds.). (1998). *Handbook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urton, L. M. (1992). Black grandparents rearing children of drug-addicted parents: Stressors, outcomes, and social service needs. *Gerontologist*, 32, 744-51.
- Burton, L. Dilworth-Anderson, P., & Merriwether-de Vries, C. (1995). Context and surrogate parenting among contemporary grandparent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0(3/3), 349-365.
- Conle, C. (2000). Narrative inquiry: Research tool and medium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3(1), 49-58.
- 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1988). Narrative meaning: Focus on teacher education. *Elements*, 19(2), 15-18.
- Connealy, M., & DeRoos, Y. (2000). Grandparenting and family preservation. In B. Hayslip, & Golberg-Glen, R. (Eds.),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pp.23-34). NY: Springer.
- Creasey, G. L., & Kaliher, G. (1994). Age differences in grand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 with grandpar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7, 411-426.
- Ehrle, G. M., & Day, H. D. (1994). Adjust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of grandmothers rearing their grandchildren.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16, 67-82.
- Emick, M. A., & Hayslip, B. (1999). Custodial grandparenting: Stresses, coping skill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grand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48(1), 35-61.
- Erikson, E. H., Erikson, J. M., & Kivnick, H. Q. (1986). *Vital involvement in old age: The experience of old age in our time*. N. Y.: W.W. Norton & Company.
- Fuller-Thomson, E., & Minkler, M. (2000). America's grandparent caregivers: Who are they? In B. Hayslip, Jr., & R. Goldberg-Glen (Eds.),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pp.3-21). N. Y.: Springer.

- Fuller-Thomson, E., Minkler, M., & Driver, D. (1997). A profile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Gerontologist*, 37, 406-411.
- Giarrusso, R., Silverstein, M., & Feng, D. (2000). Psychologic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raising grandchildren: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grandparents. In C. B. Cox (Ed.),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and stay: Perspectives on custodial grandparents* (pp.71-90). N. Y.: Springer.
- Grumet, M. R. (1990). Voice: The search for a feminist rhetoric for educational stud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0, 277-282.
- Haglund, K. (2000). Parenting a second time around: An ethnography of African American grandmothers parenting grandchildren due to parental cocaine abuse.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6(2), 120-135.
- Heywood, E. (1999). Custodial grandparents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Family Journal*, 7(4), 367-372.
- Jendrek, M. P. (1994). Grandparents who parent their grandchildren: Circumstances and decisions. *Gerontologist*, 34, 206-216.
- Johnson, C. L. (1988). Active and latent functions of grandparenting during the divorce process. *Gerontologist*, 28(2), 185-191.
- Joslin, D. (2000).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children affected and orphaned by HIV disease. In B. Hayslip, & Goldberg-Glen, R. (Ed.),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s* (pp.87-106). NY: Springer.
- Kelly, S., & Damato, E. (1995). Grandparents as primary caregivers. *Maternal Child Nursing Journal*, 20, 326-332.
- Kornhaber, A., & Woodward, K. L. (1981). *Grandparents/grandchildren: The vital connecti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 Matthew, S. H., & Sprey, J. (1984). The impact of divorce on grandparenthood: An exploratory study. *Gerontologist*, 24(1), 41-47.
- Minkler, M., & Roe, K. (1993). *Grandmothers as caregivers: Raising children of the crack cocaine epidemic*. Newbury Park, CA: Sage.
- Minkler, M., Roe, K. M., & Price, M. (1992).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of grandmother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crack cocaine epidemic. *Gerontologist*, 32, 752-761.

- Musil, C. M. (1998). Health,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grandmother caregivers.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19*(5), 441-455.
- Musil, C. M., Schrader, S., & Mutikani, J. (2000).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special coping tasks of grandmother caregivers. In C. B. Cox (Ed.),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and stay: Perspectives on custodial grandparents* (pp.36-70). N.Y.: Springer.
- Myers, J. E., & Perrin, N. (1993). Grandparents affected by parental divorce: A population at risk?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2*(1), 62-66.
- O'Reilly, E., & Morrison, M. L. (1993). Grandparent-headed families: New therapeutic challenges.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3*, 147-159.
- Pinson-Millburn, N. M., Fabian, E. S., Schlossberg, N. K., & Pyle, M. (1996).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4*, 548-554.
- Pruchno, R. A., & Johnson, K. W. (1996). Research on grandparenting: Review of current studies and future needs. *Generations, 20*(1), 65-71.
- Riley, S. (1990). Parentified grandparents in family art 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Art Therapy, 28*(4), 98.
- Roe, K. M., Minkler, M., & Barnwell, R. (1994). The assumption of care-giving: Grandmothers raising the children of the crack cocaine epidemic.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4*, 281-303.
- Rosenblatt, R. (1999, 8.2). The measure of a life. *Time*, 41.
- Saltzman, G., & Pakan, P. (1996). Feelings...in the grandparenting raising grandchildren triad (or relationship). *Parenting Grandchildren: A voice for grandparents. 2*(1), 4-6.
- Strom, R. D., & Strom, S. K. (2000).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 Human Development, 51*(3), 183-198.
- Watson, J. A., & Koblinsky, S. A. (1997). Strengths and needs of working-class African-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grandpar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44*(2), 149-165.
- Weistheimer, R. K., & Kaplan, S. (2000). *Grandparenthood*. N.Y.: Routledge.
- Wilson, M. N. (1986). The black extended family: An analytical consider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 246-258.
- Wilson, M. N., Tolson, T. F. J., Hinton, I. D., & Kiernan, M. (1990). Flexibility and sharing of childcare duties in black families. *Sex Roles, 22*, 409-425.
- Woodworth, R. S. (1996). You're not alone...you're one in a million. *Child Welfare, 75*, 619-635.

Grand Parenting Experience—A Narrative Study

Jane Chiu*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ed a narrator's grand parenting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rengths of grand parenting were: providing parenting assistance and responsibility-sharing, passing on family values and traditional heritage, developing and deepening grandparent-grandchildren bond, serving as role model and providing life wisdom. The challenges for grandparent were: managing financial difficulty and work-load, handling discipline issues, and suffering live-in parental blame and emotional outlet. For grandchildren, they grew up precociously and were unable to enjoy childhood.

Key words: adult-children experience, grand parenting,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Teachers College